

晚唐皮陆诗派研究

王永波 著

WILIAM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晚唐皮陆诗派研究

王永波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唐皮陆诗派研究/王永波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307-19606-3

I. 晚… II. 王… III. 古典诗歌—文学流派—诗歌研究—中国—晚唐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5943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27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606-3 定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皮陆诗派与晚唐诗坛·····	001
第一节 唐前诗人群体发展概略·····	005
第二节 诗人群体与唐诗史进程·····	019
第三节 皮陆诗派的形成与界定·····	025
第四节 晚唐诗歌格局中的皮陆诗派·····	038
第二章 皮陆诗派的诗歌创作·····	050
第一节 皮陆诗派的诗歌理论·····	050
第二节 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	085
第三节 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117
第三章 皮陆诗派的散文创作·····	137
第一节 皮陆诗派散文创作的主旨·····	138
第二节 皮陆诗派散文创作的特色·····	151
第四章 皮陆诗派创作异同论·····	160
第一节 皮陆诗派与中晚唐其他诗人群的异同·····	160
第二节 皮陆诗派成员之间创作的异同·····	170
第三节 皮陆诗派个人创作分期的异同·····	177

第五章 《松陵集》与皮陆唱和研究	184
第一节 苏州文会与《松陵集》的编撰	184
第二节 隐逸情趣精神风貌的真实展现	195
第三节 《松陵集》的创作特征	226
第六章 皮陆诗派的影响及其余波	238
第一节 皮陆诗派在唐末五代的影响	238
第二节 皮陆诗派在宋代的影响	242
第三节 皮陆诗派在明代的影响	247
主要参考文献	249
后记	256

第一章 皮陆诗派与晚唐诗坛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首个以诗派相标榜的文学流派一致被公认为是宋代的江西诗派。吕本中在《江西宗派图》中首先提出“江西诗派”这个名称，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并开列了陈师道等二十五人的诗派名单，以后这个名单又不断地在扩大，江西诗派遂成为宋代很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但是，在江西诗派之前，以相似诗风构成的趣味相投的诗人群体，文学史上却可以举出很多。例如钟嵘《诗品》把古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在具体的诗人品列中，他特别重视相同风格的诗人群体品评。卷中并列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并云：“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①卷下列王济、杜预、孙绰、许询，评曰：“世称孙许，弥善美恬淡之词。”^②钟嵘明显地抓住了这些诗人相似群体风貌及其共同的审美特征，虽然只是片言只语的点评，却也弥足珍贵。这种诗人群体是一种文学史上独特的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它的形成与演变也是有多种形态的。可以这么说，诗人群体的出现始终伴随着诗歌史的发展，对研究诗歌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诗人群体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汉代，但是唐代的诗人群体却尤为突出。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述历代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

①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②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①，唐代占有五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②共列三十六体，其中唐代多达二十四体，虽然这些体式多为单个诗人所创，但他们所创作的这种诗歌体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其他诗人的创作，从而形成或大或小的诗歌创作群体，带动唐诗向前发展，可见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人群体具有密切关系。而且，严羽也很重视诗人群体的创作，例如他就特别标出苏李体、曹刘体、徐庾体、沈宋体、王杨卢骆体、元白体等诸体，这些体式多由两个及多个诗人组成，相对于个人的诗歌体式，影响要大些。前人往往喜欢津津乐道大诗人对于中、小诗人的影响，其实中、小诗人群对大诗人也是提供了很多艺术借鉴的，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视。

王兆鹏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一书的序中说：“文学史与词史的实际都表明，一代文学风气的转变与形成，往往是由一代作家群共同完成的。缺乏群体的思考与整体的观念，就无法理清文学史、词史发展的脉络。而中国文学发展到宋代，先后出现了许多自觉的文人集团和创作群体，不从群体的角度去研究，也很难深入了解宋代文学的新质与进展。”^③要想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面貌和特征，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群体研究，此外，时段与地域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群体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专

①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②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③ 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著就有数十部,如王巍《三曹父子与建安文学》(辽海出版社 2002)、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中华书局 2003)、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 1996)、刘跃进《永明文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2)、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吕肖奂《宋诗体派论》(巴蜀书社 2002)、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 1986)、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巴蜀书社 2005)、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 1995)、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杨胜宽《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巴蜀书社 2001)、萧鹏《群体的选择》(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2)、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2)、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 1993)、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 1996)等。有关唐代诗人群体研究的著述也有不少,比如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 1993)、曾广开《元和诗论》(辽海出版社 1997)、任海天《晚唐诗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 2002)、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张一平《趋向自我——中唐文学四大家心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3)、萧占鹏《韩孟诗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毕宝魁《韩孟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许总《唐诗体派论》(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4)、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等。此外,辽宁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各自出版了一套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收入专著十多种。由此可见，群体研究在当下还是相当热门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研究都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本书选择《晚唐皮陆诗派研究》也是置于此种学术背景之中。

在进行研究工作之前，有几个概念想在此作些辨析，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淆。目前学界关于群体研究的定义比较混杂，有的称为“集团”，如胡大雷《中古文人集团》、贾晋华《论韩孟集团》；有的命名为“诗派”，如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萧占鹏《韩孟诗派研究》等；也有的叫做“群体”，如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萧鹏《群体的选择》等；此外也有叫“宗派”“文派”“词派”“派”的，如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严迪昌《阳羨词派研究》、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等。称谓有如许之多，似有辨析的必要。笔者认为，首先，“文学流派”是比较正式的说法，这里的流派包括“诗派”、“词派”、“文派”以及以其他方式命名的“派”。作为“诗派”，它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自觉型，另外一种是非自觉型。所谓自觉型的诗派，是指这个诗派有自己的领袖人物，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着同时代的追随者，并且有着相同的创作宗旨、文学口号和创作目的。诗派成员之间同气相求，相互往来，唱和切磋，创作风格、倾向相似，产生了一批格调相近的文学作品，对当时的文坛有着广泛的影响，比如韩孟诗派、江西诗派。所谓非自觉型的诗派，是指这个流派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并不存在自觉结合的创作集体，也没有人去号召鼓动或吸引追随者，只是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原因，有一批诗人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有着相似的风貌，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诗派，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苦吟诗派”等。其次，作为一个“文学集团”，它的形态只有第一种，也就是自觉型的。文学集团相对于诗派来说，它的含义更为广泛，集团成员之间往往联络紧密，一般来说它的领袖是政治人物，有着尊崇的地位，可以左右当时的文坛。成员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即官僚和文士。文学集团的形式有多种，比如皇家文学集

团,包括太子文学集团、诸王文学集团、世族文学集团、朝廷文学集团等。文学集团的成员对于文学领袖具有依赖性和附属性,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天生的缺陷。再次,关于文学群体的特征,王兆鹏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第一章第四节《群体特征》中将其概括为三点,即相对于正式的文学流派,文学群体具有松散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就是说诗人群体它的成员往往是分散的,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聚集到一起,但彼此之间有往来,有诗词唱和,偶尔也聚会。同时,诗人群体成员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具有开放性,也常常与群体之外的诗人广泛地从游唱和。这种特性使得整个群体始终保持着生机和活力,促进创作和发展,并扩大群体及其成员的社会声誉和文学影响。基于以上的界定,我们只能把皮陆诗人定位于诗派。

第一节 唐前诗人群体发展概略

中国古代文学的向前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文人群体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古代的文人群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走到一起,形成集团或者流派,对于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士人群体,当时的所谓文人,是从“士”阶层当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群体。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说:“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为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奸人、罪

犯、赌徒、屠夫、刺客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食劳动人民的血汗。”^①范文澜将先秦时期的士阶层按性质分为四类，那么，先秦文人群体应该算是第一类了。其实，这些人的身份主要还是学士，他们的任务往往是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要求，如果要硬性规定的话，充其量也只能定为学人群体。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②第一章里将先秦时期的文人集团分类为三种，即学人集团、门客集团和国士集团。并且认为先秦时期文人集团的形成是由于士人独立身份的取得和精神自由的获得相结合的结果，先秦文人集团也具有自主性。笔者认为，先秦时期我国的文学尚未独立尚未自觉，因此不会出现文学家群体或者是文学家集团。

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文学群体的出现应该是在汉代。汉代曾由政府出面组织过一些大型的文学活动，从而促成了一些文学群体的形成。汉代曾设置乐府机关采集歌谣，《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由赵、代、秦、楚之讴。”^③《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④《汉书·艺文志》还记载其篇目一百三十八首。汉代乐府机关里的文人一方面采集歌谣，另一方面自己也从事创作，《汉书·礼乐志》记载文人为乐府机关作诗的情况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⑤《汉书·佞幸传》又云：“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⑥这说明，在汉代的时候确实有一批文人群体在为乐府机关创作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8-249页。

② 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第四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45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第六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56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第四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45页。

⑥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三，第十一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25页。

歌诗。皇帝们也常常在宫廷里组织辞赋创作，班固《两都赋序》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藏，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①《汉书·艺文志》就记载了这些“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夫”的赋作。朝廷有时也下诏让文人们写赋，如《汉书·枚皋传》云：“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②再如《汉书·王褒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③从上述二传的记载可以得知，在汉武帝手下的确有一批专职的辞赋作家，随时听候皇帝的差遣，以辞赋创作为职事，从而形成了一批文人群体。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的文人地位低下，赋家被视为倡优、俳优，故而也谈不上真正的文学独立性。

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文学群体的出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时期，曹操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他也爱好文学，周围聚集了不少文学家，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文人群体“三曹七子”。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秋，曹操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④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占邺城，并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自称魏王，定都邺城。随着曹操军事上的胜

①（汉）班固：《文选》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页。

②（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一，第八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67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下，第九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29页。

④（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页。

利，他在文化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吸收大量的文人到幕府中来。建安文人在战乱中也有了一个可以喘息的机会和安身立命的场所。对于这点，曹植在著名的《与杨德祖书》中说：“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①曹操霸业不断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文人陆续投身曹魏阵营的过程。孔融、阮瑀、陈琳、徐干、王粲等都先后入曹魏。当然，文人们投奔曹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治而非文学，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他们来圆建功立业之梦想，但是在客观上又的确促成了建安文学的发展。在曹操的引导下，曹植和曹丕也各自吸收了不少的文学家。《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②这里所说的“置官属”实际上指的是延揽人才，当然也包括文学之士。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曹丕立为太子时，他手下的文士已经是灿然可观了，有徐干、应玚、苏林、刘廙、刘桢、王粲、郑冲、荀纬等人。同样，曹植手下也聚集了一批文士，包括邯郸淳、司马孚、任嘏、邢颙、郑袤等人。当然，曹植、曹丕兄弟文学集团的成员也是在相互转化的，比如徐干、刘桢、应玚等人先是在曹植阵营，后来又转移到了曹丕阵营。

如此多的文人集中在一起，促进了诗歌的向前发展。这些文人经历过战乱，饱受兵燹之灾害，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同情，其创作则以描写战乱、抒发忧患、渴望建功立业为主。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以及曹操本人的《蒿里行》《苦寒行》《观沧海》《短歌行》等作品，都是产生于乱世中的不朽名作。这些诗歌继承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揭露现实，同情民众，抒发理想，在思想上具有高度的进步性。在诗歌艺术上，这些作品更见个

① 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3 页。

② （晋）陈寿：《三国志》卷一，第一册，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4 页。

性，充溢着慷慨悲凉之气，建安风骨自此而形成。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①“慷慨”与“梗概”可以说是建安文学的特质，一直伴随着建安文士的创作，在诗歌中时有表现，而且影响到唐诗，后世诗评家谈及风骨，可以溯源至此。

可以说正是三曹父子的礼贤下士、延揽人才，致使“邺下文人集团”正式形成，书写了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钟嵘《诗品序》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其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②由于三曹父子的重视与扶持，此期文人的地位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曹操信任文人，让他们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比如让徐干任“司空军师祭酒掾属”，王粲、陈琳、阮瑀、路粹任“丞相军事祭酒”，杨修、繁钦任“丞相主簿”，应瑒、刘桢任“丞相掾属”，陈琳任“门下督”等，同时又让部分文人任曹丕、曹植等诸子官属，如徐干、应瑒任“五官中郎将文学”，刘桢任“平原侯庶子”，应瑒任“平原侯文学”等。随着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生活较为安定，文学的自觉性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文士们有意识地关注到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事务，举凡动物、植物、珍饰、玩物、宴饮等，都成为诗歌创作的对象，而且在技巧和辞采方面也有所贡献。“邺下文人集团”的首领当然是三曹父子，这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群体性，君臣之间相互酬唱交流的机会非常地多。曹丕《玛瑙勒赋》序以及《寡妇赋》序中有“命陈琳、王粲作”“命王粲并作之”等语。今查《全汉赋》^③目录，王粲、陈琳均有《玛瑙赋》和《寡妇赋》存世。又

①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补文心雕龙校注》卷九，上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1页。

②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③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如，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①目录可知，曹植、应瑒、刘桢三人均有《斗鸡》诗，曹丕、曹植、应瑒、刘桢、阮瑀皆有《公宴》诗，曹植、王粲皆有《三良诗》。此外，诸文士之间尚有大量的赠答诗和书信，甚至于还有相同题目的文章。例如，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②目录可知，应瑒、阮瑀皆有《文质论》，王粲、阮瑀皆有《吊夷、齐文》，曹丕、曹植、丁仪皆有《周成汉昭论》。曹丕随曹操出猎，作有《校猎赋》，并命大家同作畋猎题材的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瑒为《西猎》，桢为《大阅》。”（《古文苑》卷七章樵注引《四部丛刊》本）曹植《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③查《全汉赋》，知王粲所作为《七释》，徐干所作为《七喻》，可以看作一时游戏之作。文人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群体创作，这在邺下文人集团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群体创作，活跃了文学气氛，激发了文人表现才华的欲望，充满了文学创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建安文人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尊重，气氛和谐，群体之间往往互为赠答酬唱。据《建安七子集》^④可知，王粲有《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诗》《赠文叔良诗》《赠杨德祖诗》，徐干有《答刘桢诗》，应瑒有《报赵淑丽诗》，刘桢有《赠徐干诗》《又赠徐干诗》《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等，据《曹植集校注》^⑤可知，曹植有《赠徐干》《赠丁仪》《赠王粲》《赠丁仪王粲》等诗歌。这类赠答诗，或赞赏勉励对方，或叙述友情，或抒发自己的远大志向，无不具有浓浓的抒情意蕴。这一时期的文坛相对比较活跃，加上三曹父子的提倡，无论是在诗歌数量还是质量方

①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④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⑤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面都较前有了前进，不愧“彬彬之盛”之说。

随着建安末年“七子”的相继辞世，到了文帝黄初时期，邺下文人集团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诗人群体被零散的个体所代替。此期诗坛总的说来是冷淡的，直到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 240 到 248 年），才出现了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为首的“正始名士”和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稍微改变了沉寂已久的文坛面貌。“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都是两个文人群体，但是他们的组成人员、创作倾向、活动范围都是不尽相同的。从成员上来说，“正始名士”主要由上层社会的士人组成，这些成员基本上都是朝廷权贵或者世家大族的子弟，故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多属于政治方面，活动的主要方式为广泛的社交活动和玄学清谈，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很明显，相反文学的兴致不浓厚。从“正始名士”流传下来的著作看，基本上都是探讨玄学命题的，如何晏的《道德二论》《论语集解》；夏侯玄的《本玄论》《道德论》；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论语释疑》。这些论著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有着高度的思辨性。“正始名士”这个文人群体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文学群体，后人所艳称的“正始之音”、“正始诗风”应该指的是另外一个群体——“竹林名士”，即通常我们所说的“竹林七贤”。虽然“竹林七贤”也讨论玄学问题，写过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比如阮籍的《通易论》《达庄论》《通老论》、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向秀的《庄子注》等，但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却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由于“竹林七贤”的努力，正始文学由建安文学的梗概多气特色向哲理化倾向转变，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另一个独特的审美风貌，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地位。

关于“竹林七贤”成员的组成，《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载：“所与神交者，唯陈留阮籍、河内山涛，预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①又，《世

①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第五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370 页。

说新语》卷下《任诞第三十二》又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①从这两处记载可以看出，所谓“竹林七贤”是指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山涛、刘伶、王戎等人。当然，当时参加“竹林之游”的人一定不止这七个，例如《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就说：“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②但主要是这七个人。“竹林七贤”在诗歌上较建安文学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在作品中表现老、庄的人生境界，由此而带来文学创作的哲理化倾向，诗歌的表达技巧也进一步向前发展。

如果说建安文人的作品更多地揭露现实、抒发志向，多慷慨悲凉之气，那么，正始文人则多追求超现实的审美观念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原则。玄学思想具有否定性思维的特点，如果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否定现实事物的具象之美，对客观美持否定态度，作品中往往出现一些并不存在的逍遥世界。例如阮籍继承了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思想，在《清思赋》^③中描写了一个清虚的世界，一个可以摆脱世俗一切羁缚、精神自由遨游的天地，从而否定了现实的美。作者描写自己想要会晤的女子，是有所寄托的，明显地受到屈原《离骚》和曹植《洛神赋》的影响。它从“行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色之善”的玄学命题出发，凭借诗人丰富的想象，树立了艺术想象的原则。在《大人先生传》里，阮籍也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作精神的神游。这种想象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得到实现的，但是在文学创作上讲，却是一种新的追求，它是玄言诗和游仙诗的先端。与阮籍一样，“竹林七贤”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嵇康也追求自然的精神天地，如他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

①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0页。

②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三，第四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23页。

③ 陈伯均：《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页。